

A large, standing Buddhist statue of a deity, likely Guanyin, wearing an elaborate headdress and holding a lotus flower. The statue is shown from the waist up, with a serene expression and closed eyes. The headdress is tall and ornate, featuring a square, grid-like top. The figure is adorned with intricate jewelry and a long, flowing robe with vertical pleats.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orange-hued sky.



廈門大學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K295.73
6

莆田发展简史

谢如明 编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莆田发展简史/谢如明编著. —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6
ISBN 978-7-5615-2992-8

I. 莆… II. 谢… III. 莆田市-地方史 IV. 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960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集大印刷厂印刷

(地址:厦门集美石鼓路9号 邮编:361021)

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228千字 印数:1~3 000册

定价:2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袁锦贵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也是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大计。新形势新任务对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迫切要求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干部队伍。教育培训承担着干部能力建设的重要职责,是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战略性、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工作,是提高干部政治业务素质、加强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因此,做好新形势下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近几年来,市委高度重视干部的教育工作,始终把加强干部教育作为提高能力、服务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2003年以来,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研讨、求真务实作风教育、先进性教育、“破解发展难题,巩固学教成果”、“提高四种能力,践行八个作风,发挥骨干作用”等一年一度的教育活动,深化党员干部先进性建设,达到了教育干部、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目的。实践证明,抓好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对于加快建设湄洲湾港口城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览古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才能更好地谋划发展。中共莆田市委干部教育培训领导小组、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联合编纂的《莆田发展简史》,在突出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同时,更注重突出通俗性、可读性,起到了存史、资治、研究、教化作用。希望广大干部从莆田的发展历史中汲取丰富的营养,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地了解莆田,解读莆田,认知莆田,进一步增强又快又好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进一步坚定加快建设湄洲湾港口城市的信心,努力实现“十一五”经济翻番、港城崛起的目标,为莆田美好的前景贡献智慧和力量。

是以为序。

2007年8月



目 录

序

第一讲	唐及唐前莆田地区	(1)
第二讲	宋代兴化军	(35)
第三讲	元代兴化路	(72)
第四讲	明代兴化府	(99)
第五讲	清代兴化府	(136)
第六讲	民国时期莆仙地区	(170)
第七讲	当代莆田市发展(上)	(201)
第八讲	当代莆田市发展(下)	(226)
参考文献		(262)
后 记		(265)



第一讲 ◆ ◆

唐及唐前莆田地区

20 世纪 60 年代末,科学家对取自月球表面的岩石标本进行测定,发现月球的年龄在 44 至 46 亿年之间,根据太阳系起源的星云说,科学家们认为,地球大约是在 46 亿年前形成的。

在约 300 万年前人类诞生,中华大地是早期人类的摇篮地之一。从 100 多万年到 1 万年前,人类属于旧石器时代,尔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又经历 5000 多年后,进入青铜器时代。

莆田地区^①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当历史的车轮驶进夏商时期,莆田地区隶属“九州”之一的扬州,在西周时期是“七闽”之一,在春秋战国时期属越国地,秦代属闽中郡,汉代前期属闽越国、后期属会稽郡冶县,三国时期属建安郡侯官县,西晋时期属晋安郡侯官县,南朝时属南安郡。

^① 自宋代起,“兴化”就成为莆田专用地域名词,但历史上有兴化府(军、路),也有兴化县,为防止混淆和行文方便,本书采用分段称呼法:远古时期至宋代兴化军设立之前,使用“莆田地区”;宋、元、明、清分别使用当时各自的行政名称:兴化军、兴化路、兴化府;民国二年撤销“兴化府”后至 1983 年建立莆田市时,则使用“莆仙地区”;1983 年建市后使用“莆田市”。



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莆田县设立^①,至此,莆田地区有了独立的行政建制,而且其辖区面积基本等同于今之莆田市。唐圣历二年(699年),析莆田县西部设立清源县(后更名仙游县),莆田、仙游两县均隶属于清源郡(郡治在今泉州)。

一、新石器时期的莆田地区

莆田地区历史悠久。

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 5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莆田地区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

依山傍海的生活环境及温暖湿润的气候,使生活在莆田地区的先民们同闽东、闽南等沿海地区的居民一样以贝类为主要食物并定居,从而形成贝丘遗址的聚落形态。他们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以捕捞贝类为主,生活饮食主要是食用贝类等水产品。

考古资料也显示,当时莆田地区的先民在捕捞贝类的同时,也进行了狩猎和农业种植生产活动。由于农业的出现与发展,莆田地区先民的食物来源更加多样化,饮食结构也逐渐产生了变化。

从 1956 年起,先后在莆田县的江口镇蒲坂山、梧塘镇社仔头山、华亭镇后兰村后兰山、灵川镇柯朱山、常泰镇溪北村长头埔、埭头镇大蚶山天云洞、南日镇海山乱石山和仙游县的龙华镇灯塔村宝幢山、大济镇坑北村斐乌寨与钟峰村、鲤城街道办双桥村走马山、榜头镇窑下村洋尾山、园庄镇溪尾山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 44 处,发现石斧、石刀、石戈、石斧、石环、石球、石箭镞、石镰头等遗物 1 000 多件。

^① 依据是[唐]《元和郡县志》、[明]《(弘治)兴化府志》等。另一说是隋开皇九年(589年)立县,依据是[唐]《隋书》、[宋]《通志》和[清]《(乾隆)莆田县志》。还有一说是唐武德五年(622年)立县,依据是[宋]《新唐书》。





如,在仙游县园庄镇土楼村溪尾山遗址上,采集到大量石奔、石戈等;

如,在仙游县大济镇坑北村斐乌寨遗址上,采集到石奔 2 件、石箭镞 1 把等;

如,在仙游县龙华镇灯塔村宝幢山遗址上,采集到 1 件残面石奔;

如,在秀屿区南日镇海山村乱石山遗址上,采集到石奔 2 件、石环 1 件、石球 2 件,打破先前文史界提出的南日岛仅有 500 年历史的假说;

如,在秀屿区埭头镇温李村大蚶山天云洞遗址上,采集到大量石奔、石球等,均为新石器时代遗物。

如,在涵江区江口镇蒲坂山遗址上,采集到石斧、石箭镞等;锦江中学校园内也在解放前基建时发现石斧、石箭镞等。

1986 年,福建省再度进行文物普查时,在涵江区上郭村发现“七步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铁灶村发现“古铁灶遗址”。1987 年,莆田县 12 个乡镇再度进行古遗址文物普查,又发现 25 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如在埭头镇后壁利村及红旗水库北面约 3000 平方米的蜚尾寨半山坡遗址上,采集到石奔、石刀和敲打器、贝壳等。

这些遗物都是当时先民们从事捕捞、狩猎、农耕等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也是先民们在远古时代开发莆田地区的有力证据。特别是石箭镞的发现,说明当时先民们已开始使用弓箭。弓箭的使用标志着莆田地区原始先民征服自然能力的一大飞跃,人们可以用弓箭追杀走兽、射击飞禽、捕获鱼类,有力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发展,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资料。

从上述众多遗址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存来看,早在新石器时期,莆田地区就已经有原始人类在此繁衍生息。人们从事着捕捞、狩猎为主的生产活动,以耕耘、采集为主的原始农事生产活动是当时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而且,同其他地方一样,社会生产存在着性别的分工,捕捞、狩猎等生产活动主要以男子为主,而采集、耕耘等生产劳



动以女子为主。莆仙方言称男子为“打捕”，称女人为“室娘”，应该就是远古时期社会性别分工的语言遗存。

当时，原始手工业生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有所发展，以石奔、石刀、石戈、石斧、石环、石球、石箭镞、石镰头等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的大量制作，就是莆田地区原始手工业开始发展的最好证明。

这些生活繁衍在莆田地区最早的人群，后来发展为我国东南百越族的一支。

新石器时期，生活在莆田地区的人群已经有了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林木、动物等原始崇拜，祖先崇拜也应该已经产生。

二、商周时期的莆田地区

商周时期，莆田地区的情况又怎样呢？

迄今为止，在我市境内共发现商周两代遗址 54 处和大量的商周时期几何形的印纹陶片、陶纺轮。这些陶片属于我国“东南印纹陶文化”。

如，在仙游县榜头镇观音山商代遗址上，采集到石器、印纹硬陶等，还采集到 2 粒陶纺轮，这个遗址面积约 5000 平方米；

如，在仙游县园庄镇土楼村溪尾山遗址上，采集到饰有刻划纹、网纹、方格纹的软陶壶、陶罐等 20 多件；

如，秀屿区南日镇海山村乱石山遗址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商周时期的遗址，考古人员在此采集到众多石器和陶片等，还采集到 1 粒陶纺轮；

如，仙游县钟山镇鸣和村土城也发现一处商代遗址，采集到硬质灰陶和黑陶残片等；

如，在仙游县龙华镇灯塔村宝幢山遗址上，采集到 11 片篮纹陶、



刻划纹陶、条纹陶等印纹硬陶，均为商周时期遗物；

如，在仙游县大济镇斐乌寨遗址上，采集到 5 片印纹软陶残片等商周遗物；

如，仙游县游洋镇梧椿村吴仓遗址和大济镇钟峰遗址也发现了商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是用黏土烧制成的器皿，是用于打水和煮食的；

如，在城厢区常泰镇利洋村乌宫山遗址和溪北村长头埔遗址上，采集到 85 片商周时期红夹砂陶、灰硬陶碎片等遗物；

如，涵江区庄边镇前埔村鹧鸪墩商周时期遗址分布范围约 2500 平方米，采集到大量黑、灰、红夹砂陶与灰泥质陶碎片。

如，在秀屿区埭头镇温李村大蚶山天云洞遗址上，采集到大量石器及黑、红夹砂陶片等，说明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这里一直有先民在此生活繁衍。

还有涵江区的白沙镇、荔城区的新度镇、城厢区的华亭镇等，也发现了商周文化遗址，采集到大量遗物。

这些遗址和文化遗存充分说明，当时居住在莆田地区的商周时期先民，不仅继续从事农耕生产、捕捞作业和狩猎养殖等，更重要的是原始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磨光石器为主的生产工具制作技术进一步提高，是原始手工业发展的首要表现。诸如石斧、石刀、石戈、石斧等各类石器大都类型分明，而且制作精细，刃口锋利，眼孔钻磨匀称；

二是陶器的烧制是商周时代最具特色的手工业。商周时期莆田地区先民烧制的陶器有黑夹砂陶、灰夹砂陶、红夹砂陶和灰泥质陶等，均为手制，器壁厚薄不匀，器表上有篮纹、刻划纹、条纹等装饰纹，器形简单；

三是原始纺织生产出现。在榜头、南日发现的陶纺轮充分证明，当时先民们已开始从事原始纺织生产。纺织的出现表明莆田地区先民们的衣着是纺织布衣，取代了兽皮树皮的保暖遮羞方式，这是社会经济进步的结果，也是文明曙光出现的标志之一，进入了野蛮时代中



级阶段^①。可见，这一区域的先民具有较高的智慧。

据史料分析，当时活动在莆田地区的先民可能已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可以从莆田县、仙游县两处无人能辨识的“仙篆”得到证明。

一是荔城区西天尾镇九华山一巨石上古时有纵横如篆的字迹。明《（弘治）兴化府志》载：“九华山有仙篆石。”宋代莆田籍诗人方翥（生卒年与里籍不详，字次云）写有《仙篆石》一诗：“何人远眺睨绝顶，一树一石探幽奇。虫文鸟篆不可识，如读峒嵎禹字碑。”^②

二是仙游县石所山上古时也有“仙篆”。明《（弘治）兴化府志》载：石所山在来苏里何岩之东，“绝顶有石池、清泉、棋局、马迹，及石上有篆字百余，如以锥画地成龙蛇状，皆不可读”。清代仙游籍诗人王寿楸写有《登石所山观石上古篆》一诗，诗云：“丹崖古篆百余字，奇奇怪怪同石鼓。韩公苏公生已遥，谁把新诗纪视缕？仙溪仙水自清幽，何必寻幽到峒嵎！”^③

这些字迹（图案）从古到今始终无人能识，因而相传为“仙篆”。“仙篆”出自何时何人之手，更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原始图像文字，有的说是汉代东越人所书，有的说是古代畚民所作，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幹先生经过认真考证，认为是古百越人所作可能性较大，属西周时期的“七闽”部落文化遗迹^④。

当时，生活在莆田地区的先民继续信仰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以及森林木石等，祖先崇拜的宗教性更加突出。同时，有了图腾崇拜，并虔诚地侍奉着形形色色的巫鬼神灵。

① [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

② [宋]祝穆：《方輿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6月。

[明]周瑛、黄仲昭：《（弘治）兴化府志》，[清]同治十年重刊本。

[清]廖必琦：《（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莆田市图书馆藏书。

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③ 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年12月。

④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年。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莆田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莆田地区的开发继续缓慢地进行着。当时,中原地区已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华夏族逐渐形成。

周显王三十六年(前 333 年),越国被楚国所灭,部分越国人沿海路向南播迁,给莆田地区带来了中原与吴越较为先进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类型以越式青铜器为特征,1978 年在莆田县城郊乡下郑村(今城厢区龙桥街道办事处下郑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附近发现一把青铜钁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把青铜钁长 21.5 厘米,宽 10.7 厘米,刃宽 9 厘米,是迄今为止福建省所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青铜钁是商代早期出现的一种青铜器,一直沿用到战国时期。据《说文解字》载:“钁,大钬(锄)也。”莆田县发现的这把青铜钁,从造型、纹饰等综合来看,专家认为属春秋战国后期所造。由此可见,越人的先进稻作技术已经在本区域传播。

越族人南迁福建,与土著居民互相融合,逐渐形成新的部落,即闽越族。此时,生活在莆田地区的先民是闽越族的一支。

春秋战国时期,莆田地区民间宗教信仰有了进一步发展,天、地、动物、植物、山、石、江河等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浓厚,现今仍盛行于莆阳大地的“风水林”等信仰应当是旧时林木等自然崇拜的延续。图腾崇拜也进一步发展。蛇、猴崇拜至今尤盛,称为“青公庙”的蛇王庙和塑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形象的猴王庙遍布兴化大地。牛崇拜风气也非常浓厚,至今依然。



四、秦汉三国时期的莆田地区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需要,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将商鞅变法后已在秦国实行的郡县制推广到全国,分天下为 36 郡,后来又增加闽中郡等 4 郡,莆田地区是闽中郡的一部分。

秦朝以苛法严刑治国,实行残暴统治,造成“赭衣塞路,圜墙成市”^①的悲惨景象,最终激起全国农民大起义。无诸率领包括莆田地区人民在内的闽越人北上中原,追随鄱阳令吴芮参加反秦斗争。秦朝灭亡,楚汉争夺天下,闽越人附汉反楚,帮助刘邦击败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汉高祖五年(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册封无诸为闽越王,治理闽越国,即闽中郡故地。

汉初,生活在莆田地区的百姓继续开发着莆阳大地。中原地区的胡姓等汉人移居莆田地区,并且逐步与土著居民融合,一起开发着莆田地区。他们在发展土著文化的同时,积极吸收中原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发展生产,先进的稻作文化逐渐取代了靠贝类为主要生存条件的土著文化。其中,最大成就是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铁制用具广泛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之中,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安居乐业。

汉元鼎六年(前 111 年),闽越国余善叛乱。汉武帝调遣四路大军围攻闽越国。今涵江区白沙镇、新县镇、庄边镇、大洋乡、仙游县钟

^① [东汉]班固:《前汉书》,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 12 月。





山镇、游洋镇、石苍乡等广大山区是双方交战的主战场之一，这里至今仍流传着余善在此举兵反汉兵败的传说，白沙镇的越王台、榜头镇的鸡子城、钟山镇的蛇湾城、游洋镇的龙穿城等遗址至今犹存。宋代邑人进士方叔震在《越王城》中这样写道：“闻道越王避汉兵，窄身岩谷覬偷生。如云甲马今何在，只见良田万顷平。”^①读罢此诗，当年大规模厮杀、尸横遍野的情景在时隔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平定叛乱后，汉武帝以“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②为由废除了闽越国，下令将其城池、要塞尽毁，把包括莆田地区百姓在内的闽越人强迫迁往江淮地区，“地遂虚”^③，只有少数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居民逃过此劫，仍然生息、繁衍在深山老林里，延续着土著文化。这些逃居山里的闽越人在后世文献记载中有着各种身份：东汉六朝时期叫“山越”^④；唐宋明清时期称“溪峒”、“峒僚”^⑤，也就是现今的畲、瑶、黎等少数民族的先民。

因遭受兵灾、移民、虚地等惨祸，此时的莆田地区人烟稀少，经济凋敝，与汉初闽越国时期经济兴盛、人民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不可同日而语。

汉昭帝时，中原与外省客户又陆续迁入。传说中的何氏九仙就是为避淮南王刘安叛乱，从安徽庐江入闽，最后定居于今仙游县九鲤湖（图 1-1），炼丹跨鲤成仙的。羽化跨鲤登仙只是神话传说不必深究，但这则传说却说明汉代已有中原人迁入莆田地区，开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此时，莆田地区属会稽郡冶县管辖。

① [清]郑王臣：《莆风清籁集》，莆田市图书馆藏书。

② [汉]司马迁：《史记》，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 年 12 月。

③ 同②。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⑤ [宋]刘克庄：《漳州谕余》，载《后村先生大全集》。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齐鲁书社，1996 年 8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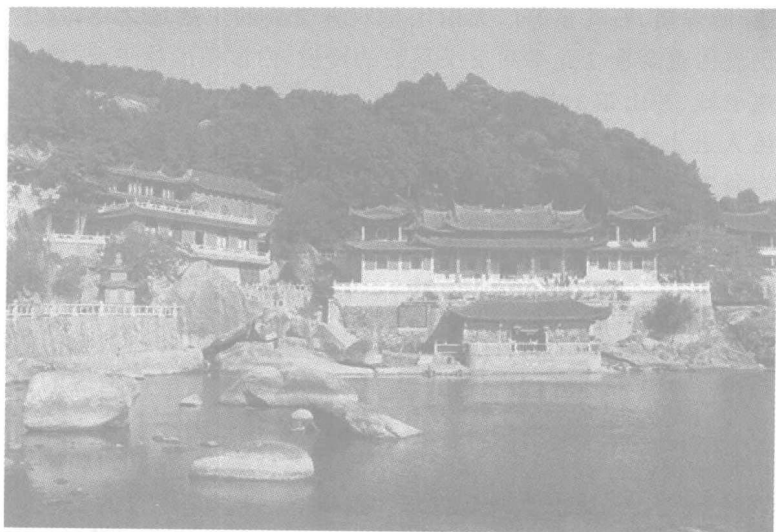


图 1-1 何氏九仙炼丹成仙的九鲤湖

汉代,流行于中原地区的木偶艺术已传播到莆田地区。1960年莆田县志编辑委员会编著的《莆田戏剧史》记载:“相传汉武帝时,东越王余善,与其兄郢相攻杀,帝遣兵讨之,余善窜入广业深山中,士卒无聊,善命捏泥为头,编竹为身,取藤为线,作傀儡戏……”。这里的“广业深山”,就是今涵江区大洋、庄边、新县、白沙四镇山区,正是当时莆田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中心。

东汉末年,莆田地区属会稽郡侯官县管辖。

三国时期,吴国将领贺齐率兵入闽,莆田地区处在孙吴政权统治之下。从东汉末年开,长江、黄河流域处于军事斗争漩涡,烽火连绵,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移。莆田地区僻处东南海滨,远离战争区域,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吸引了北方汉族人民大量移民而来,人口迅速增加,北方汉族人民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大大改变了莆田地区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都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造船和航海

事业更有了较大的进步，逐渐从汉武帝以后的凋敝停滞景象中恢复过来，为莆田地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国时期，莆田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水平提高，蛮荒之地得到大量垦辟，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

二是纺织业、制陶业等手工业生产也有新的发展，从而推动了商品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三是造船与航海技术进一步发展。孙吴政权对造船和航运十分重视。莆田地处木兰溪下游入海口，是一个天然良港，加之拥有丰富的林木资源，发展造船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当时，莆田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海运贸易是紧密相连的，海运贸易成为莆田地区经济的重要内容。[晋]左思在《吴都赋》里这样写道：“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包括莆田地区在内的福建船工、航海家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航海技术，迅速地到达航海目的地。

三国时期，莆田地区属建安郡侯官县管辖。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闽越没有受到汉人或汉文化渗入而发生生态经济环境的大改变之前，土著社会的族群分化是不明显的，刀耕火种和泛海捕鱼也仅是其多种经济方式和生活来源的一种。随着汉文化的不断南渐，汉文化逐渐取代以土著文化为核心的传统，并成为包括莆田在内的福建的主流文化，“蛮獠(畲)”、“疍”等文化因素被边缘化，最终形成了所谓“在山为畲”、“在水为疍”、“在平地为汉”的族群格局以及社会分层。

秦汉三国时期，莆田地区的宗教信仰进一步发展，民间信仰更为广泛，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巫术崇拜等非常流行。史书这样评价：“信巫鬼，重淫祀”。特别是诞生于东汉末的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已逐步传播到莆田地区，兴化大地至今还保留着多处遗迹。富有地方特色的何氏九仙信仰、九华山陈姓仙人信仰、壶公山胡姓仙人信仰产生并不断发展。